

明代江南文学世家文学活动的家族化特性

许菁频

内容提要 家族化是世家文学与生俱来的特性。明代江南文学世家的文学活动在人员构成、活动形式和活动内容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家族化烙印。具体到文学创作,则从体裁的选择、题材的确定,到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均呈现鲜明的家族化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家族化特性的世家文学活动无疑具有显著的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 文学世家 明代江南 家族化 诗礼传家

许菁频,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310012

文学世家发展到明代,南宋以来逐渐形成的以江南为核心聚集区域的生态分布状态凸显得更为淋漓尽致,数量上亦有长足发展,而这为清代江南文学世家的“井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区别于乡邦文学、台阁体文学,文学世家的“文学”与“家族”之间有着深度的关联性^[1]。这种关联性使得明代江南文学世家的文学活动在人员构成、活动形式、活动内容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家族化烙印。而家族化特性的世家文学活动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文学活动主体构成的家族化特征

“诗礼传家”的明代江南文学世家,宴饮赋诗、应制酬唱是世家成员的日常生活,“祖孙相继、兄弟并辔”^[2]成为其文学活动主体的主要构成形态。例如,明代中期苏州昆山顾梦圭家族,其祖父顾鼎臣、父亲顾潜皆有诗文传世。而顾梦圭的两个儿子顾允默和顾允焘都入室梁辰鱼,在戏曲方面颇有造诣。再如,明代太仓王锡爵家族是当地名副其实的望族。王氏家族兴盛于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延绵流长至清末,在政坛、文坛、画坛皆有不俗表现。王锡爵、王鼎爵兄弟同为进士,王锡爵、王衡父子同为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编号:15BZW105)中期成果。

[1]参见罗时进:《家族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与问题视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2]俞樾:《恽氏家乘原序》,恽宝惠纂修《恽氏家乘》“原序”,光裕堂铅印本1949年版,第16页。

榜眼。王锡爵是万历皇帝亲政时期的宰辅,著有《王文肃公全集》五十五卷,《四库存目丛书》收录。儿子王衡才华横溢,在诗文、书法、戏曲方面均有较高造诣,是声名远播的才子。明末清初王锡爵之孙王时敏是娄东画坛的领袖人物,喜好吟诗论曲。王时敏第三个儿子王撰是清初文坛“娄东十子”之一,而孙子王原祁则名列清初画坛“四王”之一,且工诗善文。文学世家之所以能以“世家”相称,应该具有“两代及以上知名文学家”^[1],因此,父子兄弟同登文坛成为文学世家的常态,甚至有延绵三十世以上的,如嘉善钱氏(钱士升)世家,而明清常州恽氏(恽日初)历时十六世,经历四百余年,期间文学家多达五十余人,文学专集有近六十部。明代文学世家祖孙、父子、兄弟驰骋文坛的现象不胜枚举。

女性文学创作作为明代江南文学世家的文学活动增添了瑰丽的色彩,其创作主体在成员构成上同样呈现为家族化特征,表现为在同一家族内部,母女、婆媳、姊妹、姑嫂、妯娌均吟诗诵词的不在少数。明以前从事文学创作的女性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来自官宦之家,如班昭、蔡文姬、李清照等人;一类是来自青楼曲院,如鱼玄机、薛涛、朱淑真等人。总体上数量不多,且其创作多属于个人化行为。至明代,如季娴《闺秀集》中所云:“自景泰、正德以后,风雅一道浸遍闺阁,至万历而盛矣。天启、崇祯以来,继起不绝”^[2],以家族为中心的女性文学成为明代江南女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万历年间,嘉兴黄承昊家族,妻女、从妹、子媳皆雅善吟咏,且有文集传世;华亭王凤娴与二女张引元、张引庆均工诗善词。世家中女性文学“簇生”现象的产生主要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一是诗文传家的家学传统。文学世家殷切期盼子弟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往往将进行诗书教习的规定写入宗规、家训之中,且不仅针对家族中的男性子弟,而且关乎女性群体。二是闺秀唱和的文学氛围。接受家庭教育是女性进行文学创作的前提和基础,而来自同性的唱和则是女性文学创作的內推力。结社集会、题词作序、选编文集等等文学活动,以往多为男性文人所垄断,而至明代,也成为文学世家中女性的文学活动方式。如沈宜修编《伊人思》,收晚明46位女子之诗。又如明末以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为核心人物的桐城“名媛诗社”,通过诗歌唱和,扩大了方氏,乃至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队伍。三是相对宽松的社会文化背景。社会对女性从事文学创作的认同对明代江南文学世家中女性进行诗文创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明朝设立了女性官职,主流文化圈对女性才能颇为重视,晚明李贽、汤显祖、冯梦龙、钱谦益等对于妇女处境及妇女意识尤为关注,提倡及奖掖妇女文学。李贽在《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中甚至提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3],否定男女见识有别的看法。

文学活动形式的家族化特征

明代江南文学世家文学活动形式多样,既有文学创作、诗文评鹭,家集编刊,也有结社唱和、各类文学总集的编选。这其中既有家族成员个体和家族内部集体的创作与批评,又有家族成员与同时代文人之间的文学交流与合作。虽然文学活动形式多样,参与者亦各有不同,但明代世家文学活动形式的家族化特征还是十分鲜明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文学创作常常以家族的园亭书斋为聚集地,基于家族关系的亲友联唱成为明代结社唱和的重要组织形式。明代中叶江南经济发展迅速,造园之风逐渐兴盛,特别是嘉靖隆庆年间,江南私家园林荟萃。世家大族以不菲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修建山林别业、庭院楼阁,成为家族子弟完成文学训练和文学继承,以及以文会友的理想场所。明代万历年间杭州仁和卓明卿家族修有芳杜洲、东园、竹

[1]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2]季娴:《闺秀集选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1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331页。

[3]李贽:《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焚书》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9页。

里馆、水一方等花园别业,既是家族子弟休憩、攻读、以文会友的场所,也是私家藏书之地。卓明卿侄子卓发之有七律《七夕同于乙先、陈古白集芳杜洲》、周榘五律《登月波表兄园楼》等诗歌或赞叹卓氏家族的高阁楼宇,或歌咏在芳杜洲花园的宴饮赋诗,是当时家族诗文唱和的佐证。明代著名戏曲家汪道昆在为卓明卿写的传记中写道:“筑芳杜园,树花木千本,竹万个,供诸开士倾耳高谈”^[1],王世贞、文徵明、钱谦益等文坛大儒亦有作品吟诵芳杜洲,可见当时卓氏私家园林聚会的盛况。明代中后期嘉兴望族项元汴家族的“天籁阁”名震四方。“天籁阁”不仅是项笃寿和项元汴兄弟、项元汴和项穆、项德成、项又新父子觞咏之所,也是陈继儒、董其昌、文寿承等文坛名宿慕名燕谈之处。

家族的馆舍园林是家族文人成长的见证,族人园宴吟诵愈演愈烈,单纯的聚会雅集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以家族关系为纽带的结社唱和氤氲而生。“明代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的鼎盛时期”^[2],而这些社团中,成员构成以世家大族子弟为主的为数不少。明末社事兴盛,仅次于复社的几社,由陈子龙、夏允彝、彭宾、杜麟征、徐孚远、周立勋首创^[3],其后社员增至百余人,但几社择友甚严,大多为六子之昆弟、姻娅及门子弟者,以此可知明代世家大族通过结社加强子弟之间的文学交流。又如,崇祯年间的小筑社是余杭严氏家族中严调御、严武顺、严敕三兄弟所创,而其目的则是“欲绍振家学,兄弟自相师,为文力追正始”^[4]。弘、正年间,江苏宜兴杭济、杭淮兄弟与李梦阳结社,“兄弟徜徉林壑,唱和成集”^[5]。此种家族结社发展至清代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例如,顺治、康熙年间的惊隐诗社是清初江南的重要诗社,成员以五经叶、吴两家为骨干,而清初越中的蓬莱社则以孙、徐二氏为主要成员。

第二,各类文集编选和刊刻往往凝聚着一个家族的心血,是家族文学传统和文学理念的体现。家集的编刻对于文学世家而言意义重大,是其文学血脉的延续,因此,世家大族对族中子弟文集的哀辑和刊刻异常重视。从明朝正德年间至清朝光绪年间,长洲彭氏家族延续长达十四世,诞生进士17人,是名副其实的科举世家、文学世家。彭氏历代以刊刻家族文集为己任,同治、光绪年间的彭祖贤在先人基础之上,集家族之力,刊刻《长洲彭氏家集》18种,堪称巨帙。以文徵明为首的长洲文氏在明代的文学、书画、金石等方面有着不俗的表现。万历年间,文肇祉搜罗自高祖文洪至其弟文元发的诗集八种,刊刻成《文氏家藏诗集》十八卷,后又从中选取文洪、文徵明、文彭、文嘉和自己的诗作编成《文氏五家集》十四卷,被收录于《四库全书》。此外,明朝吴江叶绍袁辑录的《午梦堂集》、无锡钱氏《三华集》、昆山张氏《娄上编》等,均是以编刻家族成员的文学作品彰显家族的文学成就,从而达到青史留名的目的。

家集如此,大型文集的编选更是集全族之力而成。在明人所编的大型文集中,为数不少是属于江南文学世家所辑。明代中期无锡俞氏家族辑有《盛明百家诗》。这部上起洪武下至隆庆的明诗总集共收录诗人300余家,诗歌324卷,嘉靖至隆庆间陆续刊刻。诗集的编选者是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俞宪,但这部总集的诞生离不开族人的大力支持。诗集的材料如俞宪所言“遍索亲友中”^[6],且诗集由于工程浩大,至俞宪谢世,仍未完成,故有其子所补者。又如归安茅氏家族,茅坤编辑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是一部散文总集,收录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共计164卷。这部文集是茅坤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辞官隐居家乡后所编,万历七年(1579),由侄子茅一桂校勘,并在杭州初次刊刻。茅坤亲自撰写总叙和论

[1]汪道昆:《卓澄甫传》,《太函集》卷三十六,明万历刻本,第12页。

[2]李时人:《明代“文人结社”刍议——李玉栓〈明代文人结社考〉序》,李玉栓著《明代文人结社考》,〔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页。

[3]杜登春:《社事始末》,涨潮、杨復吉、沈楸惠等编纂《昭代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4]张吉安主修、朱文藻原纂、崔应榴、董作栋续纂:《余杭县志》卷二六《严武顺传》,清嘉庆十年刻本,第19页。

[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264页。

[6]俞宪:《盛明百家诗·明诗凡例》,《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04册,〔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402页。

例,外甥顾尔行题辞。崇祯四年(1631),茅坤孙子茅著精校该文集原稿,并由苏州金阊拥万堂梓印,该版十分热销,成为清代《文钞》的通行本。这部集家族之力完成的《文钞》影响深远,唐宋八大家之名亦由此而来。其余如山阴祁氏家族祁承熾辑的大丛书《国朝征信丛录》、无锡邹氏家族邹漪辑的《名家诗选》二十四卷、杭州洪氏家族洪楸编著出版的《清平山堂话本》等均浸润着家族、宗族子弟的心血。

文学创作的家族化特征

明代文学重心的逐步南移是有目共睹的,江南文学世家文学创作的繁盛亦是众所周知。从体裁、题材到风格,明代江南文学世家的文学创作均被烙上鲜明的家族化印记。明代文学世家家学传承的发达导致其创作的文学体裁往往一脉相承。所谓“家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家学指家族传承的专门学术性的私学,广义的家学指诗书传家的文学艺术创造活动。”^[1]以此论之,则明代江南文学世家广义的家学是具有普遍一致性的诗文创作,而狭义的家学各有不同。吴江沈氏家族将曲学作为家学,几代衣钵相传。沈氏最负盛名的戏曲家是明代万历年间的沈璟,在他的带领之下,沈氏家族共有四代人积极从事戏曲创作和演出,甚至诞生了中国古代第一位女性剧作家叶小纨。锡山秦氏始祖秦观是北宋著名词人,其后代亦以诗词传家。明中叶秦旭创碧山吟社,约十老吟诗为乐,“诗名擅一时,垂奕世。而当时家庭间,又每以诗训其子若孙,故秦氏诗学遂为家传。”^[2]其后,儿子秦夔、秦奭,孙子秦锐、秦铨、秦镗等人,均有诗歌传世。此外,湖州凌氏(凌约言、凌迪知、凌稚隆)于史传文学作品的倾心、钱塘陆氏(陆云龙、陆人龙)于小说创作的钟情均是一脉相传的。

明代世家文学创作题材的家族化倾向十分鲜明。出身名门望族的世家女子,自幼禀承家学,饱受家族文化熏陶,因此,明代江南文学世家中的女性文学创作题材,除闺阁女子惯常的生活经验、轻愁浅怨外,家族亲情、家族盛衰之感亦是创作的主要内容。明末吴江叶绍袁家族“门内人人集,闺中个个诗”^[3]。沈宜修出身名门望族,是山东副使沈琉之女。嫁入叶氏后,与丈夫、三女,以及诸姑伯姐吟诗作词。其中,沈宜修与三个女儿的诗词中,亲情的写作是最为醒目的。面对长女和三女的早逝,对亲人的深切怀念成为沈宜修诗歌创作中最感人的内容。她甚至模拟《楚辞·招魂》的形式,写了一篇《拟招》来招两位亡女的魂魄。此外,沈宜修的三个女儿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诗词中同样亲情澎湃,彼此的思念、牵挂成为创作的主要内容,十七岁未嫁而逝的叶小鸾绝笔诗《秋暮独坐有感忆两姐》亦是表达对两位姐姐的深切思念之情。明末文学世家中的女性文人面对家国动荡常常会写作以往女性极少涉猎的家族变迁之思。如山阴祁氏女性杰出人物商景兰的《烛影摇红》一词,被赵尊岳极力推崇,在《明词汇刊》中称其“以朴语写至情,寓家国之感于变徵之音”^[4]。商景兰的儿媳朱德蓉创作的诗歌《哭修嫣》、《咏虞姬》均是抒发家国之痛。这些作品对故国的思念与对社会治乱之方的思考是普通闺阁女子所不具备的,其胆略甚至超过了一般的男子。

与女性相比,江南文学世家中的男性创作题材更为丰富。明末常州恽氏家族面对异族入侵,有多人参与了抗清斗争,因而对明季国事的不满、对满清铁骑入侵的痛恨成为恽氏家族诗文创作的主要内容。恽厥初的《知希庵稿》、恽日初的《不远堂文集》、恽格的《南田诗钞》、《瓯香馆集》等作品充溢着国破家亡的悲苦,交织着血与泪、冰与火冲突的爱国主义主题,为明末恽氏文学抹上亮丽的一笔。钱塘田氏则属意于游记。田汝成的二十四卷《西湖游览志》和二十六卷《西湖游览志余》皆为《四库全书》收

[1]罗时进、陈燕妮:《清代江南文化家族的特征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2]秦镗:《樗林摘稿后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

[3]叶绍袁:《天寥年谱别记》,叶绍袁原编、冀勤辑校《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92页。

[4]赵尊岳辑:《明词汇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99页。

录。其子田艺蘅所著杂俎笔记《留青日札》包容万象,游记是其中重要的作品。长洲文氏艺文兼擅,诗书画造诣非凡,因此,题画诗成为文氏家族文学创作的强项。文徵明与儿子文彭、文嘉,孙子文肇祉、曾孙文震亨等创作了数量众多的题画诗,成为文氏诗歌创作中不容小觑的一个部分。

明代世家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的家族化特征同样值得注意。在家族文化与家族教育的共同作用下,文学世家成员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往往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明中后期吴县黄氏,黄鲁曾、黄省曾及黄省曾子黄姬水均善诗文,虽成就不同——黄鲁曾与黄省曾兄弟诗才平平,而黄姬水却才华远高于父辈,但诗歌理论却是父子相继,均主情求真,取法六朝古诗,追求婉丽灵秀的诗风。昆山归氏,归有光对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造成的文坛“相与剽剽古人,求附坛坫”^[1]的现象深恶痛绝,提倡抒发真情,注重悯时忧世。这一文学主张得到了儿子归子慕、孙子归昌世、曾孙归庄的积极响应。归子慕的五言诗质朴淡雅,旨趣悠远,颇有陶渊明的神韵。归昌世“持身行己,不受缁涅,一稟震川之旧”^[2]。归庄虽以“狂生”自命,但古文亦以情感深沉著称。无锡顾氏,不论顾宪成还是顾允成,散文均以直抒胸臆见长。共同的教育背景和家风熏陶是文学世家成员文学创作风格一脉相承的最直接原因。

世家文学活动家族化的文学史意义

明代江南文学世家的文学活动从人员构成到活动形式、活动内容和风格等均带有深刻的家族化烙印,其文学史意义不容忽视。其一,明代江南文学世家以家族之力进行家集编刊和大型文集编选,催化了清代文学世家家集编刊热潮的到来,且为清代大型文集编选盛世的形成做了铺垫。家集的编刻不惟有“颂扬祖德,以示门第高崇”^[3]之意。据徐雁平在《清代家集与文化传统》一文中的统计,家集在明以前数量甚少,元代家集只有15种,“明清是家集编辑刊刻的繁盛期,明代有125种(含小部分清人编辑),而清代的家集,可以查阅的有782种,见于目录或其他文献记录的、以及暂不能查阅的有164种,合计共946种(有小部分为民国时编辑)。”^[4]自明至清,家集在数量上突飞猛进,对此,徐雁平指出:“清代文学家族如此热心编辑刊刻,是族性意识强化的一种表现,这是在梳理强化家族文学传统。”^[5]诚然,正是明代日益强化家族文学传统,才会迎来清朝家集编刊的大爆发。清代世家对家族文学传统的重视,正是明代世家对家学重视的一脉相承。

清朝学术文化集前代之大成,诗文创作远超前代,诗文总集的编撰亦创辉煌成就。清初对文治武功的重视使得文坛产生了数目可观的御选、御定文学总集,进而在“康乾盛世”诞生了《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等规模宏大的类书、丛书。不惟朝廷,清代文人亦自发进行大型文集的编选、整理工作,其中尤以文学世家子弟为多。例如,江苏常熟钱氏家族钱谦益编纂了明代诗歌总集《列朝诗集》。共81卷,收录1600余家诗人的作品。浙江秀水朱氏家族朱彝尊编有《明诗综》一百卷、《明词综》十二卷。常州恽氏家族女性诗人恽珠辑刊清初至道光近二百年间女性诗歌总集《国朝闺秀正始集》二十卷、《国朝闺秀正始续集》十卷。这些家族在明代就已出现有两代以上知名文学家,步入清代,钟情于文学的家风使得族中子弟积极从事编纂大型文集的工作。

其二,明代江南文学世家家族化的结社唱和对清代文人结社产生重大影响。受明朝影响,清代家族性结社唱和愈见炽烈。无锡秦氏在清代续演明朝秦旭创碧山吟社一幕,于康熙中期再创碧山吟

[1]钱谦益:《题归太仆文集》,《钱牧斋全集》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0页。

[2]钱谦益:《归文休墓志铭》,《钱牧斋全集》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0页。

[3]王雨:《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4][5]徐雁平:《清代家集与文化传统》,《南京》《古典文献研究》第十八辑上卷,2015年11月,第39页,第39页。

社。社员共有二十一人,秦突然、秦五辑、秦俨亭等秦氏子弟是其中的生力军。清初越中蓬莱社以余姚孙氏(孙如洵、孙以衡、孙有闻)和上虞徐氏(徐咸清、徐承清)的族内子弟为主要成员。无锡云门社在清初江南颇有声名,顾景文与弟顾贞观,刘雷恒与弟刘霖恒携手入社。顺治康熙年间的惊隐诗社以吴江叶、吴两家为骨干。顺治十年嘉善小兰亭社创立,首领为嘉善曹氏家族的曹勋与从弟曹溪,另有族中子弟曹炯、曹尔埏、曹子翼、曹起邠、曹十经、曹赞可等共十二人入社。清代族内结社的现象比明代更为普遍,这既是受明代结社家族化影响所致,也与清朝文学世家数量激增有关。

其三,明代江南文学世家文学活动的家族化特性,既是明代江南文学世家文学活动繁荣的保障,也是清代江南文学世家密集问世的主因。文学活动成员的家族化构成使得不论是编选文集、组建参与文社还是进行文学创作,明代江南文学世家都是有着家族子弟共同推助的痕迹,从而有效促进了明代江南文学活动的发展。正是由于明朝崇祯年间恽厥初辑刊《恽氏家集》,其高祖父恽釜《溪堂集》二卷、祖父恽绍芳《林居集》十二卷和《考盘集》四卷才得以流布天下。常州庄氏是明清时期的望族,明中叶庄祿中进士步入仕途,一举成为家族文化基业的开创者,至明末庄起元与同祖兄弟庄廷臣双双高中进士,门庭更为煊赫。庄氏“族内相师友”的现象十分普遍,且族内结社文会在庄起元时已是常态,至清朝乾隆十四年庄氏的“南华九老唱和”传为文坛佳话,同时也标志着“庄氏家族文学进入鼎盛时期”^[1]。

清代江南文学世家数量惊人,仅杭州和嘉兴两府就有 284 家^[2],究其缘由,与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密不可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明代江南文学世家文学活动的家族化特性亦是造成清代江南文学世家数量剧增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理由有两点。第一,晚明已具有两代以上文学家,入清后继续壮大发展的文学世家数量颇为可观。不论是吴江沈氏(以沈璟为核心人物)、汾湖叶氏(以叶绍袁为核心人物)、宝应刘氏(以刘心学为核心人物)、昆山归氏(以归有光为核心人物)、昆山顾氏(以顾炎武为核心人物)、太仓王氏(以王世贞为核心人物)、太仓王氏(以王锡爵为核心人物)、常熟冯氏(以冯武为核心人物)、常州恽氏(以恽寿平为核心人物)、锡山秦氏(以秦夔为核心人物),还是归安茅氏(以茅坤为核心人物)、吴郡陆氏(以陆倕为核心人物)、海宁查氏(以查慎行为核心人物)、秀水朱氏(以朱彝尊为核心人物)、秀水李氏(以李良年为核心人物)、钱塘洪氏(以洪昇为核心人物)等,均是由明入清的文学家族,在明清两朝文学传承均有两代以上。之所以能成为横跨明清的文学世家,家族人才链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因为明朝江南文学世家注重对家族人才的培育和家族文化氛围的营造,从而成功地使家族完成了由明入清的文化承继。

第二,清代兴起的文学世家在发展过程中自觉承继明代文学世家的文化传统,家族化的文学活动一脉相承。清代江南文学世家对家集编撰的热情、对大型文集编刊的热衷,以及对家族内结社酬唱等活动的迷恋是有目共睹的。而在文学创作上,清代文学世家从创作体裁、创作内容到创作风格同样具有显著的家族化特性。例如,清代中期常州张氏家族张惠言开创常州词派,主张言外有意和比兴寄托。其弟张琦亦是常州词派中坚力量,兄弟合辑《词选》。张惠言儿子张成孙能传父学,著有《萍聚词》一卷。外甥董士锡 16 岁即从张惠言游,词作深受张惠言影响,由此可见张氏在词创作上的家族化特征。又如苏州潘氏家族性喜填词,以乾隆时期潘世恩及其三子潘曾沂、潘曾莹、潘曾绶为代表。家族化的文学活动是明清文学世家活力的保障。

[责任编辑:平 啸]

[1] 萧晓阳:《明清昆陵庄氏家族文学雅集与姻娅关系》,《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2] 曾礼军:《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时空分布与文学建设》,〔金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